

從全球戰略視角看中國當前的宏觀緊縮

◎ 王 建

由於投資增長過猛，能源、原材料、運力等供應短缺加劇，以及物價水平不斷攀升，出於對中國經濟會出現嚴重過熱的憂慮，中國政府已經出台了一系列宏觀緊縮政策，並已見到了效果，政府的宏觀調控似可以告一段落了。

實際上，我們對中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看得可能有些過於悲觀了，因為此次經濟高增長主要是被投資需求拉動的，而到2004年第一季度，投資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單一因素。例如，第一季度GDP的增長率是9.8%，但進口是負差，消費增長率比經濟增長率低0.6個百分點，所以消費和出口對新增的GDP都沒有貢獻，新增GDP全部都來自於投資需求的貢獻。投資增長快的領域都是那些供給嚴重短缺的領域，隨著投資增長高峰過去，就會由新增生產能力填平供求缺口，而且這種情況正在出現。例如，鋼鐵在近兩年漲價最厲害，但據有關部門估計，今年中國的生鐵產能將增加五千萬噸，煉鋼產能將增加四千萬噸。此外，由於中國目前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在發展，並至少在五年內難以依靠建立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來緩解，因此總供求格局將是不斷趨向於總供給過剩而不是總需求過剩，這就決定了不管是近期還是中期，出現嚴重通脹的可能要遠遠小於出現嚴重通縮的可能，所以對投資會持續過熱和走入嚴重通脹的擔憂是沒有根據的。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約束不在內部而在外部。去年中國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鋼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資資本的25%，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漲，無疑與中國的強勁增長有直接關係。這還僅僅是開始，拿鋼鐵來說，世界工業化國家在人均GDP2,500美元水平時，人均鋼鐵蓄積量都在5噸以上，去年韓國和日本的人均鋼鐵蓄積量都是將近10噸，而中國去年鋼鐵總蓄積量只有不到20億噸，人均只有1.5噸。超過人均5噸後，一國的鋼鐵生產將進入以再生金屬循環為主，例如發達國家的煉鋼原料80%以上是廢鋼，只有15-20%是用鐵礦砂煉製，但去年中國廢鋼在煉鋼原料中只佔20%，其中六成以上的廢鋼還是靠進口。去年中國進口的鐵礦砂已經達到1.5億噸，是世界全部鐵礦砂出口的30%。按到2030年中國人口16億，人均GDP5,000美元和人均鋼鐵蓄積量7噸計算，中國的鋼鐵總蓄積量將超過百億噸，每年消費的鋼鐵將超過3億噸，消耗的鐵礦砂將超過6億噸，已經超過目前全球的可貿易量。如果考慮到中國人均耕地稀少，工業化和城市化只能通過提高城市土地的容積率來實現，房屋建築消耗的鋼鐵可能會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還有發展出口所消耗的鋼材，年均消費的鋼鐵就可能超過4億噸。這麼大的需求量，國際市場可能支撐嗎？

比鋼鐵更嚴重的問題是石油和糧食。目前世界的全部石油產量是40億噸，據說最高可能增長到45-50億噸。目前石油的世界貿易量是16億噸，相當於全部產量的40%；如果全球產量可達到50億噸，貿易量可能增加到22-23億噸。世界工業化國家的人均石油消費是1噸以上，16億人口的中國如果也完成工業化，就要16億噸石油，但國內由於資源條件限制，最大產能目前看只能有2億噸，就是說有14億噸要靠進口，要超過全球石油可貿易量的60%，餘下的只有不到9億噸，而目前美、日、歐的石油進口總量就超過了12億噸，中國可能得到這麼多嗎？

有些人可能會奇怪，為甚麼目前中國的GDP只佔全球4%，就會對國際市場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似乎是突如其來。我認為主要有四個原因。

第一，中國以GDP衡量的總產出雖然在全球佔有的份額小，但製造業所佔的份額並不小。中國由於在改革前走了一條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現象，即與同等人均收入國家相比，農村人口比重特別大，而農村人口的服務業消費大多採取「自助」方式，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服務產業不發達。例如人均GDP1,000美元的國家，服務產業比重一般都在50–55%，而中國2003年只佔33.1%。所以單純比較GDP，中國的經濟規模就顯得比較小，但若比較製造業規模，中國就不小了。例如，2003年美國的GDP接近11萬億美元，中國還不到美國的13%，但在美國的GDP中製造業只佔11%，而中國卻佔到三分之一，所以，去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折美元已達4,675億美元，而美國去年約為12,100億美元，中國已是美國的39%。

其次，發達國家由於技術先進和產品加工程度深，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淨產值比率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淨總產值比率一般都在50–55%，而中國目前的平均比重還在30%，所以如果比較製造業的總產值中國就更大。與美國比較，2003年中國的製造業總產值約為1.6萬億美元，而美國約為2.4萬億美元，中國已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二。淨產值只包含了勞動者報酬、稅金、利潤和折舊，總產值中則還包含了原材料與能源的消耗，所以比較總產值規模，更能看出一國經濟增長對世界資源的需求及其影響。

第三，從90年代後期至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增長都呈停滯或下降的趨勢。1996年美國的製造業在GDP總值中比重還超過18%，為1.34萬億美元，2003年已下降到11%，只有1.21萬億美元，是負增長。中國的工業生產同期卻呈現高速增長趨勢，在GDP中的比重從1996年的42.5%上升到2003年的45.3%。所以世界新增的工業產出中有相當大的部分集中到中國，這也是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的結果，必然會使世界製造業對世界資源的需求向中國轉移。

第四，中國長期以來都是主要靠國內資源支撐自己的發展。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增長加速，國內資源開始顯露出難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勢頭。1992年中國糧食出現淨進口，1993年中國石油出現淨進口，1995年初級產品貿易出現改革以來的首次逆差，為29億美元，到2003年已擴大到380億美元。有些人指責說中國近年來大量進口能源、礦產和原材料是因為經濟增長方式太粗放，這個看法並不全面。以近年來進口增長最快的原油來說，中國每億元GDP消費的石油1990年為5.32噸，2000年為1.46噸，2003年為1.43噸，是呈下降趨勢，反映出中國的能源使用效率是在不斷提高。中國原油進口2002年為7,000萬噸，2003年為9,100萬噸，2004年頭五個月為5,000萬噸，全年進口可能要超過1.2億噸。2003年中國新增石油進口已佔全球新增供應量的35.5%，2004年第一季度已佔到55%。進口猛增也不是因為原油需求猛增，1990–2000年中國石油消費的年均增長率為6.9%，而2001–2003年為6.8%，基本上沒變化。原油進口猛增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國內原油生產增長速度下降。例如80年代的石油生產年均增長率為2.67%，90年代就下降到1.67%，2001–2003年又下降到1.47%。所以，中國對世界資源的壓力，主要是因為需求穩定增長而國內資源供應難以適應帶來的。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今後的每一步增長都會增加對世界資源的需求，而當世界日益感受到中國的需求會最終改變國際初級產品供求格局的時候，對中國的資源進口限制就不可避免的到來。中國在沒有大的國際制約的環境下發展經濟的時間，我看頂多只能持續到2010年以前，就是還有五至六年的時間，如果在這段時間裡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實行「自我約束」，就會錯失寶貴的「戰略機遇期」。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制約不僅來自於國際經濟，還來自於國際政治與軍事鬥爭。冷戰已經結束了十多年，但新世紀初正開始展現出美歐對立的前景。美歐間衝突的核心是美元與歐元對世界貨幣霸權的爭奪，這場爭奪戰才剛剛開始。「九一一」以後，美國迅速以反恐為名出兵阿富汗，接著又佔領了伊拉克。跟著又與阿塞拜疆簽定軍事條約，擁有了軍事基地，隨後又策動格魯吉亞的「天鵝絨」政變，趕跑了親俄親歐的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在巴勒斯坦，美國操縱以色列對抵抗勢力進行肉體消滅，最近又對敘利亞進行經濟制裁，逼迫敘利亞政權臣服在美國之下。美國還以反恐為名，提出要在馬六甲海峽派兵，雖然遭到印尼和馬來西亞拒絕，卻得到了新加坡的配合。至於巴基斯坦，是伊斯蘭國家中唯一支持美國反恐戰爭的國家，早已加入了美國的陣營。如果我們把這些國家用一條弧線鏈接起來就會發現，美國的這一步步安排，已經把從裡海到中東這個世界最大的石油資源區圈了起來，從而可以利用對世界主要石油資源的控制，「西壓歐盟、東控東亞」。所以美國學者克萊爾（Michael T. Klare）在他的新作《資源戰爭》（*Resource Wars*）中說，石油對美國而言不是意味著燃料，而是意味著權力。這個石油控制圈目前還有一個缺口，就是土耳其，所以可以預言，下一步美歐對決的地點就是土耳其。歐盟可能會加快拉土耳其入歐盟的步伐，美國也會在土耳其上演有聲有色的爭奪戰。

東亞是對美國提供貿易逆差的最大地區，約佔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七成。美國與歐洲爭奪貨幣霸權的目的，就是為了能用美國的虛擬資產從東亞地區換取實物產品，所以美國目前的全球戰略必然是「擾亂歐洲、穩定亞洲」。陳水扁競選連任後，許多人都認為爆發台海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美國仍然會以武力支持台灣。我不這麼看，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安排。美國為了保住在東亞的物質利益，從穩定東亞的戰略要求出發，會壓制陳水扁的胡鬧。如果陳水扁真的一意孤行，硬要唱台獨的戲，美國寧肯把台灣作為禮物送給中國也不會冒與中國翻臉的風險，因為中美衝突的真正得益人不是台灣，而是歐洲。

中美之間正在呈現出愈來愈多共同戰略利益。美國需要來自中國的巨大貿易逆差支撐其經濟增長，中國則需要美國的巨大市場拉動經濟增長。2003年中美貿易逆差已達1,230億美元，而中國當年的貿易順差只有255億美元，即中國用從美國得到的美元從世界其他國家進口了急需的實物產品。所以中國是世界上享受到美元世界霸權的最大國家，這是中美關係漸行漸近的動因。

但是美國畢竟在中東和中亞石油資源區也劃了一條東向的弧線，這樣就可以在美歐衝突時利用石油利益把日本和中國綁到自己的戰車上。如果中、日不伏貼，短期乃至中期內由於石油供應短缺，就會導致經濟增長萎縮。而一旦美國與法、德、俄之間要憑軍事實力對決出誰是世界的老大，也很難說世界的石油、鐵礦和糧食的供應還會像目前這樣正常。所以，中國應對世界可能出現的惡性經濟波動及早準備對策。

從目前看，美國對全球主要石油資源實施控制的戰略還沒有完成，可能還需要兩至三年左右的時間，當然時間也可能更長一點。而一旦完成就有可能和歐盟攤牌，所以世界和平發展的時間可能只有五年左右，已經不多了。

同時，也不能排除美國在兩年內就與歐盟攤牌的前景。就在5月1日歐盟二十五國同唱「歡樂頌」的時候，全球油價已經攀升到十幾年來前所未有的水平。油價上漲並不是OPEC減少了產量，反而是在OPEC各國早已突破了產量上限的時候出現的。究其原因，又是與2001年一樣，是由於紐約期貨交易所的石油期貨交易量突然放大造成的。在歐元上漲的背景條件下，油價上漲有利於歐盟而不利於美國，美國反而在這樣的條件下，把油價打高，並且把戰略儲備油

的上限從6億噸提高到7億噸。可以設想，如果美國再次在海灣地區策動一場戰爭，必然會像科索沃戰爭和去年的海灣戰爭一樣，把歐元匯價打下來，從而使歐洲受到石油供應和高油價的雙重威脅，逼歐洲臣服。

所以，我們不能認為讓中國經濟停一停沒有甚麼關係，似乎經濟調整好了，還可以像以前一樣在世界和平的環境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還可以從世界上通過貿易和平索取。中國已進入到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都需要國際資源支撐的時代，如果資源來源顯著減少甚至在一個時期內斷絕，經濟增長必然會停下來。

因此，通過宏觀緊縮讓中國經濟的增長步伐慢下來，從國內看是有道理的，從國際看就有問題了。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凡事都得從世界的高度考慮而不能關起門來想問題。「對內過於悲觀、對外過於樂觀」的思想，顯然是缺乏從世界看中國這個高度。因此，中國不應對目前的經濟高增長進行「自我限制」，而應抓住未來幾年難得的和平發展時機，盡量加快發展步伐。面對未來趨於動盪的世界，中國的經濟規模每擴大一分，就可以增加一分安全保障。

王 建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研究員。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各部委獲科技進步獎。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4年8月號總第八十四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